

# 闽东畬族文化地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过程

蓝炯熹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民族研究所,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 本文选取若干发生在闽东畬族乡村等地的文化地理坐标建构畬族文化地图,并着重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展示畬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过程。

**关键词:** 畬族;传统文化;现代文明

欧洲学者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区分了“文化”与“文明”的两个概念,认为“文化”是民族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是民族的自我与特色;“文明”是各民族差异性的逐渐缩小,表现为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简言之,“文化”表明民族相异,“文明”标识民族趋同;其次,“文化”是一种不必经意的传授,由耳濡目染而获取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等,而“文明”是需要后天习得的知识、教养等;其三,在某种意义上,各个民族的“文化”常常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往往是始终运动的、前进的,表现为对固有文化的扩张与覆盖。即“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的如影随形的眷恋和影响,而“文明”与未来契合,表现为将来发展的趋势与走向。<sup>[1]</sup>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现代化,各个民族所属的传统文化必将与反映时代色彩的现代文明对接,被现代文明所吞噬和“殖民化”。

从福建畬族的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来看,一般认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畬族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的建构始于明代,终于清季。而畬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的过程也恰恰从清代开始,经过民国时期的互动,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而实现。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认为:“历史学者必须或多或少程度上是地理

的。反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由于‘现在’的概念——或者任何其他时期——是抽象的,所以,地理工作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历史的”<sup>[2]</sup>。因此,本文选取若干地理坐标,来展示“时间、空间和社会存在的三方辩证关系”<sup>[3]</sup>,通过坐标所提供的意境,而浏览与解读闽东畬族文化地图来展示闽东畬族的文化活动以及现代文明对其影响。这是三个世纪的畬族乡村的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漫长历史过程,是耐人寻味而又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悲喜剧的轮番上演。

文化地理坐标1:康熙六年·畬民‘免差徭’的石碑

为了行文的需要,我们权且作一个地域的跨越,将闽东畬族文化地图的坐标移到闽中——福建省仙游县博物馆(原文庙正殿回廊左侧)里现存一通关于畬民‘免差徭’的石碑上。据传,该石碑是康熙六年(1667年)曾立于兴化府前的。其石碑上方刻一篆书‘清’字,碑文以正楷阴刻,文曰:

“圣王御极,皇仁浩荡,凡民间一切差徭,蒙谕查实豁免,况雷、蓝、盘三姓畬民原无一定住籍散,自食其力。沐历代洪恩,载入流烟册内,概免一切差徭。如福州各属畬民现有勒石优免。独兴属(兴化)例动欺孤丁单姓,诸色杂差丛集,畬民是以疾于奔命。

本年五月内,畬民蓝圣时等永保畬民生聚等事,

\* 收稿日期 2006-11-30

具呈总督部院大老爷高蒙批府行县查例。幸蒙本县主正堂加一级萧 照例具详并飭示禁在案,但恐年久月深,风雨损坏,谨勒 圣朝浩荡之恩,督宪矜恤之仁也。

谨志!

时龙飞岁次丁未年 戊申之秋。

畬民蓝圣时、朝容、雷永雪、蓝元长、振 、元贤、秀、祐、圣、妹、 、雷、钟 等同立。”  
【上述碑文中的符号“ ”,为字符模糊而无法识别者。】

对石碑进行类似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解读,即将石碑产生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交代后,重点在探求石碑所透露的畬民族的精神信息和畬族传统文化的“话语构成”。石碑是物质的,却不是一般的固定实体,而是出现在特定时空中,表现了一定的精神情境。石碑是历史的,具有不可重复性,但是人们可以借助这“通灵”之石的能产性,抒发不尽的遐思。该石碑延续着畬族经济生活的一个传统,虽不在闽东地界,但是闽东曾出现过类似上述内容的政治文书,如今闽东类似的石碑已不复存在,尚留在闽东畬民家族谱牒的记忆系统中。

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安县田螺园《冯翌雷氏宗谱》载《福宁府石碑文》云:

“福宁府霞浦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曹 为呈请立碑等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二十一日,据畬民钟允成等具陈前事,词称:成等始祖乃高辛皇帝勅居山颠,自食其力,不派差徭,历代相沿,由来已久。叠蒙历朝各宪布化宣仁,案炳日月。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又蒙董州主赐立石碑,永禁各都乡保滥派畬民差徭。各县石碑现存可考。惟州前,即今府前石碑被毁,各都保遂有滥派、索贴之弊。成等呈恳府宪徐 蒙批候檄飭严禁,毋许各都保滥派尔等差徭,并索贴差徭,俾其各安生业可也。合请金恩伏愿准立碑,永彰鸿案,脚结不朽等情。据此,为查畬民钟允成等,前蒙本府宪徐檄行出示严禁在案,兹据前情,除核案批示外,合再示禁。为此,示仰各都保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照宪,毋得仍前滥派畬民差徭,借端索贴抗累,并索砍竹木等项,俾得各安生业。倘敢故违许准,受累畬民,指名直禀,以凭拿究。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给”

田螺园《冯翌雷氏宗谱》又刊载了清乾隆三十九年福宁府福鼎县正堂的告示,其内容与上述者大体相同。认为“畬民散居穷谷,人迹罕至,实属深山五谷,素沐皇仁,得沾雨化,历免差徭,由来已久。现各县俱有石碑仍存,惟霞邑(即霞浦)石碑被毁。近因村都乡保,勿论奉公,滥派差徭,即属无事,不时索贴乡民,抗累乡愚,确有

实情,所以具禀,另请畬保长宁固地方。……仰恳天台,一体同仁,皇准照旧勒石复碑,以杜滥派,豁免差徭,百年千秋。……”

闽东畬民家族中普遍认为,以上两个石碑就分别立于福宁府衙和福鼎县衙。

清代编户齐民的社会制度,不完全等同于明代。虽然,其户口类别中主体仍是民户,但是,构成民户的人员不同,即包括当地的土著者、流寓人口入籍者、八旗人口被销除旗档者、汉军出旗者等。对属于“苗夷”的畬民,封建王朝对他们的编图隶籍和编甲完粮却是一个渐进的登录过程,即虽同属于畬民,却在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区别对待。入清之初,有许多汉化程度高的畬民村落已早早进入了封建户籍之网,如处于客家地区的汀州府畬民早就是黄册齐民,其“有田产者,亦必输粮而给官差。”<sup>[4]</sup>清乾隆《龙岩州志》载:“今畬客固安分,而汉纲亦宽,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sup>[5]</sup>上杭县庐丰乡蓝氏《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载:“我国田赋,肇自禹贡。后代虽有轻重,然田必有赋,固一定法。族自子荣公建基庐丰后,开垦莲塘,大明定鼎,遂承充胜运里二图四甲,里长后归长房袭顶。至清代,族人开户日众,惟永清公裔虽各房另立分册,而总册仍称“富户。古代完粮规则,每田载税一斗,即该完米一合。而民米扣算,每升则完银三分六厘。时分两忙,上忙于秋收后完,下忙于冬收后完。至于业权转移,须印契割。永清公裔未经别立户记。每岁定于元月初五日,会集核册自行推收过割。富户粮额多冠全杭(上杭)。”<sup>[6]</sup>

处于闽南福佬人聚居地的畬民乡村的状况,则大体类同于闽西。据康熙《平和县志》载:“今则太平既久,声教日讫,和邑诸山木拔道通,……瑶僮(指畬族)化为齐民。”<sup>[7]</sup>乾隆《永春县志》载:“邑有畬民……今具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异。”<sup>[8]</sup>民国《德化县志》载:“畬民“入清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sup>[9]</sup>但是,处于偏远山地的零星村落的畬民仍没有进入户籍制度的视野,他们还是作为“化外之民”,既不承担赋役的义务,也不享有黎民百姓应有的权益。乾隆《龙溪县志》载:“畬民“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sup>[10]</sup>

闽东与闽中、闽北还没有进入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视线,以上康熙六年(1667年)立于兴化府的畬民“免差徭”石碑,正是说明了这种现象。清初朝廷对处于流烟之民中的边缘化“苗夷”——畬民,还是以熟视无睹的态度不予理睬,相当宽容地不考虑他们的入册问题。但是,上述这种“垦山为业,租庸不及”<sup>[11]</sup>的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

随着畬民村落的稳定发展和与当地汉人交往的频繁,畬民逐渐被当局所确认并相继纳入了户籍制度的图册。这该是区乾隆年间的事了。以上“免差徭”石碑等政治文书资料透露了闽东畬民民族文化与风俗文化的特有信息。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了闽东畬族文化变迁之旅。

文化地理坐标2 乾隆十五年·古田县四都上洋畬村

乾隆十五年(1750)清廷开始酝酿绘制《皇清职贡图》,八月十一日,四川总督策楞接上谕,要求策楞将其辖境中的“西番”等异族男妇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随后,策楞将所绘苗疆民族图24幅进呈御览。军机处收到此图后,对原图作了修改,并以统一版式,于乾隆十六年送回策楞,命将所属民族照统一版式绘图。同年六月一日,大学士傅恒向各督抚发告谕旨:“大学士忠勇功臣傅恒奉上谕: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獠,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于是,各地便开始了绘制当地异族的行动。<sup>[12]</sup>乾隆《古田县志》刊载了福建省画工奉谕描绘古田县畬民草图的过程,文曰:“今则附近民居在邑之四都上洋等村,与民往来交易,亦有承佃民业为生业者。但畬民由来虽久,尚未载入邑志,因乾隆十七年七月内奉督抚两院宪绘画畬民图册具奏恭敬,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行知在案,附载风俗之后,以备查考。”<sup>[13]</sup>古田县除了四都上洋畬民村外,还有十七都富达畬村和四十六都梅坪畬村等主要村落,画工仅以四都上洋村畬民为蓝本勾描草图。乾隆皇帝钦定宫廷画师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分别为《皇清职贡图》第一至第四卷的绘制者,命他们将各地呈送的草图绘为正式图卷,每卷为一式三份,并册页一份。到乾隆二十二年全国各地呈送中央的草图及注文已汇齐军机处。经过4年的绘制,于乾隆二十六年始告完成。福建绘制的“苗夷”图刊载于《皇清职贡图》第二卷,为宫廷画师金廷标绘制。所绘“苗夷”包括古田、罗源畬民。每幅图上均附有满、汉两种说明文字。闽东畬族乡村编图隶籍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是《皇清职贡图》中的所勾勒的畬民形像大约可以推算出与乾隆十五年相近的年代,这时封建朝廷已经完成了对畬族乡村的政治、经济的管理,势必也松动了与世隔绝的闽东畬族传统文化的基石。

文化地理坐标3:嘉庆七年·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

随着乡村聚落的形成和家族的兴隆,畬民便开始重

视对家族子孙的汉文化培养与教育。闽东畬族乡村私学始于清代,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福安县潭头前村《蓝氏宗谱·家范》载:“延师教子为父兄所当然也,茅地处乡曲欲延师甚难,……(举村)同心协力,可有家勿与困有家相较,况世少不教而善之人,亦不教而不善之人。古云:千金难买子孙贤;又云: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因此,畬民家族中一般由村庄富裕户为首发起延请私塾先生,其他户送子附读私塾先生多为汉族,也有个别由畬民担任。家族势力较强,便办起了书馆,接纳家族子孙住馆攻读,并使用传统的蒙学教材,以便逐步形成与汉人相类的耕读并举的文化传统。

闽东畬民应试之路是异常艰难的,道光《重纂福建通志》载,嘉庆七年(1802年)福鼎县童生钟良弼赴福宁府试,有书生王万年串通生监诬蔑“五姓”(蓝、雷、钟、吴、李)畬民为“犬生”,公然将钟良弼赶出考场。钟良弼遭辱后义愤填膺,遂变卖家产上告,钟的义举得到了乡亲的支持和捐助。诉状历经县、府,屡遭周折,数月后转呈省衙,福建巡抚李殿图刚廉正直、深明大义,他阅状曰:“方今我国家天山南北……其路通为四疆,北路为准噶尔地,即与畬民无异。……娼优隶卒三世不习旧业,例尚准其应试,何独畬民有意排击之,……”<sup>[14]</sup>饬令府、县严讯详复,并布告士林。处以王万年责打三十大板,逐出县衙。次年,福鼎县岳廷元主科试,钟良弼再次应试,终于考取府学生员第二十二名。钟良弼上告胜诉,继中秀才的事迹被畬民歌手编成长连(即小说歌)在闽、浙畬民中广为传唱,经久不衰。钟良弼事件表明了,通常以判例法为主干的清廷法律对畬民应试的认可。这个事件载入官方志书加以披露,使得闽东各地乡村畬民从此可以挺直腰杆走进各级考场,吸纳主流文化,造就自己的文化精英。最为著名的是,从道光至光绪的六十年间,仅霞浦县半月里畬族村就连续诞生雷世儒、雷步缘、雷步武、雷加润、雷加上5位秀才。

同属于闽东的古田县富达畬村是汉化程度较早的村落,该村村民应考,并未受歧视。村民蓝孙璇(1697~1793),自幼聪敏好学,雍正七年(1729年)考中举人,乾隆二年(1737年)中进士,乾隆三年任顺昌县教谕,乾隆八年升任山西省怀仁县知县。<sup>[15]</sup>

文化地理坐标4 嘉庆十六年·宁德县猴墩村口石碑  
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八都镇猴墩畬族村的旧路口有一通石碑,镌刻的是清嘉庆年间的县衙告示,全文如下:

“特授宁德县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一级吴  
违例巡洋等事——



本年十月十五日,据雷朝元、蓝奶弟、钟文乐等呈称:住居九都猴墩(即猴墩——引者)地方,安业田园。所有巡洋各人向在平洋查看,从无间至。元等山宅巡查,田园有被盗时,元等向投不理。凡遇收成,各到山宅额外索取,被盗无赔。迩来并裸粮又要索取。元等理论,反欺畲民山宅,摩拳擦掌,种种被陷。切思巡洋所以御盗,被盗投验赔偿,故得抽送。似此,夜巡不到,被盗投验不理,凡有所收,一切统要额外抽送,且被盗更多,为害不浅焉!用此巡洋为哉?元等合同公议,各人自种自看,不失守望相助之意,无滋抽费,以省事端。现在本年八月,元族于闽坑林姓互控,元等即行各人自看田园,并无被盗。但未蒙给示,苟延一时,恐将来仍蹈旧辙,争闹滋弊,畲民奚堪。无奈呈恳恩准给示,以杜后患等情到县。

据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处居民人等知悉,嗣后该处田园,以及裸粮等项,听雷朝元等自行防守,不许棍徒包揽巡洋,致滋事端。倘有前项匪棍仍前包揽,许即协保禀解赴县,以凭究治,毋得始勤终怠。亦不得藉端滋事干究。特示!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廿一日给告示!

发九都猴墩,实贴晓谕。”

与此相类的政治文书的石碑在宁德市蕉城区还有四通,分别立于七都镇海潮山畲村、赤溪镇岑田畲村、飞鸾镇长园畲村、八都镇新楼畲村,还见于霞浦县溪南镇半月里畲村。海潮山畲村和岑田畲村均题款为《奉县告照》。

前者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初三日由宁德县正堂给示:“为出示严禁恶丐强乞,以静地方事”,文曰:“本年八月十九日,据八都等处乡民蓝聚春等公全呈:‘切民等地处山僻,务农为生,终年勤苦,往往恶丐结党成群,横行乞食。每至收成之时,丐等聚夥身怀利刃,环集田园强讨,要稻谷钱物。不遂其欲,甚至持刀吓诈,拦阻打稻,不容收获。稍与计较,则装伤倒诬,鸠集多人拼命记赖,不服理谕。山村家数既稀,来城控告路途又远,惟以无事为安,遂至任其诉索。即非收获之时,每到各家勒乞,不如意,则鸡豚、农具皆敢窃取。若不公诸严禁恶风,乡民何能平静度日等情到厅。’处此,除批示,责成丐首严加管束,合行示禁。为此,求谕该乡民蓝聚春等知悉:自示之后,如有恶丐到村强乞,任意逞刁。倘敢再犯前情,准该乡民等会同地保投送赴县,恐有流丐到村,人命毒赖,地保消理,严以凭律究惩办,俱各禀遵毋违。特示!右仰知悉!”

后者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日宁德县正堂给示:“为出示严禁事”,文曰:“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据十

一都岑田村畲民蓝先寿、洋成、同先、春顺、伏成、雷朝子、钟兰邦、清顺,地保傅咸贤、其成等呈补录:‘寿等岑田上下村、宫后门、肥垵村,有二十多家,筑寮散处一隅,均为农业。近因恶丐群居附村,聚赌饮鴆。寿等田园锥扑蹭蹬,固已难堪。丐且欺凌地僻,男妇日出耕作,家仅女子幼孩。丐则三五成群勒讨饭米钱文。如遇登场收获,丐则勒索田粟。若非随索随给,敢则入寮吵扰。遇便鸡只、农具,以及屋前蔬菜、柴薪,晒曝粗衫、短裤任意搜取。如值耕农归来,撞见,阻则藉端敲诈,继则引众残疾病丐扛伤,变态多方,困苦难言。况岑田地属僻处,从前那有一二流丐到门告乞,寿等给其饭米只钱,丐则欣然而去。近来农景愈歉,丐则愈增。在寿等贫民为作,尚难自给,在游手之无赖之,辄群党,何侨济为。寿等山乡僻处,非比城市,何堪强丐勒索。如前,惟有恳恩出示严禁,俾恶丐畏法,不至强讨无厌。庶民业得安,地方安靖。为此,俱情金叩乞台前,思怜前情,示禁施行,合乡感戴,颂德千秋。切里等情到县。’据此,查恶丐强乞,藉端讹扰,实为间阎之害。据呈前情,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示该处诸色人等知悉,嗣后遇流丐到门告乞,如实系贫无聊生者,尔等乃勿吝撮米只钱,随时施给。倘有成如结队,多方强索,甚或乘便搜取物件,及以残疾丐类抬赖滋扰,则是警不畏法,断难稍事姑容。准尔等协同乡保获住,捆送赴县,以凭究办。但不得擅行殴打,滋生事端,致于并究,切切毋违。特示!……右仰知悉!”

较之“免差徭”类政治文书,“禁骚扰”类政治文书出现的年代稍迟。由于,清代的闽东畲民村落,分布零散、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这给土匪、盗贼和无赖之徒可乘之机。他们为所欲为,横行畲村,直接破坏村落的宁静,而畲民家族又往往势单力薄,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根治忧患,消弭威胁。为此,家族中人便有所求于县衙,县衙视其情况颁布告示,酌情保障了畲民的部分权益,于是,“禁骚扰”类政治文书便应运而生,畲民家族因此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实惠。由于这类政治文书直接关系畲民的切身利益,畲民家族均异常珍重,既刊载于家族谱牒,让族人永远铭记;又勒石于乡间,昭告四乡村民。

在“禁骚扰”类政治文书的同时,出现巡洋社,该社为乡间村民组织,多系玩枪弄棍之徒,与畲族村民无涉,他们只会向畲村摊派,却不能行使应有的职责。往往遇盗不理,而遇畲村收成时,却前来强行索取。畲民稍有指责,他们便“反欺畲民山宅,摩拳擦掌,种种被陷”,畲民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巡洋“违例”,是明火执仗,助纣为虐,理当革除。若改为畲民自行巡洋守护,则“巡洋”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更大,经初步尝试,产生良好的效果。畲

民的上述请求得到了宁德县衙的批准,猴墩畲村自行建立了巡洋队伍,护卫本村。巡洋队伍从小到大,发展迅速,波及宁德八都的十余个畲民村落。这些畲村纷纷效法,互相呼应。到了民国时期,仍延续这种传统,并成立了猴墩巡洋总社。由雷氏家族族长任总社社长。“禁骚扰”类政治文书为研究闽东畲族政治文化和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实物资料。

文化地理坐标5 咸丰七年“德政碑”

今福安市文化馆藏有一通残碑,据考此碑是清咸丰年间福安乡民为其县令李鼎而立的“德政碑”,该碑原立于县城文庙内,其碑留下的残文曰:

“……所至皆有政声,丁巳间,署篆福安。廉洁……即拳拳以勤学兴贤为首务,……邑金斗量畲民负隅,愍不畏法,往往……不慑服远窜,数十年地方之害,公力除……”

参阅光绪《福安县志》内曰:“知县李鼎,浙江鄞县人,监生,咸丰七年署。断案明允,重士恤民,去之日,民立德政碑。”<sup>[16]</sup>

金斗量今名金斗洋,是福安市康厝畲族乡所辖的一个以武术为闻名天下的畲族村落。在福安穆洋一带流传一则掌故,即清雍正年间,力倡反清复明的南少林寺武僧林铁珠,隐姓埋名号称“潘”先生(又称“樊”先生),藏匿于金斗量畲村,教村民习武。故该村男女个个能拳善棒。康熙时,该村曾出过艺德双馨的雷国楚,他曾是当时穆洋仇教(天主教)排教的领导人之一。金斗量畲村的桀傲锋利,素为清政府所不容,咸丰七年(1857年),因该村为“数十年地方之害”,故被福安县令李鼎所“力除”。据金斗洋村的畲民说,这场浩劫的实施者是福宁府的杨镇台。当人们在查阅金斗洋村(即金斗量)《雷氏族谱》时,族谱中便有原族谱于咸丰年间“毁于火”的记载,至于被毁缘由,则语焉不详。畲族历来有反抗封建官府的传统,从唐代开始,在封建时代,几乎福建省的每一件战事均或多或少与畲民有涉。金斗量事件可看成是上述传统的一个印证而已。金斗洋事件反映了清政府民族政策的另一面,当畲族乡村势力扩展到令统治者不安的程度时,国家机器便会展露出狰狞的牙齿。从金斗量村落的现有建筑中,人们可以依稀看到易攻善守的营造格局。除此之外,金斗洋畲族村还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便是那闻名遐尔的金斗洋畲族拳多组套路。

文化地理坐标6 同治十三年“雷震昌号”茶庄

茶之“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sup>[17]</sup>福建是中国的重要茶区,清代,茶树遍植福建的山区丘陵。宁德“其地山陂,洎附近民居,旷地遍植茶树,……计茶所收,有

春夏二季,年获利不让桑麻。”<sup>[18]</sup>闽东名茶,福鼎有白琳,福安有松萝,以宁德的支提为最。<sup>[19]</sup>白琳、松萝(松罗),均有畲民聚居地。十九世纪是福建茶叶贸易的黄金时代,每年茶叶的输出量居全国首位。当时,在国际茶叶市场也风靡一时。茶叶畅销,引起茶市勃兴,福州南台(今台江)成为福建重要的茶叶商埠。咸丰五年(1855年)有5家洋行“在福州抢购茶叶,竞争日剧”。“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sup>[20]</sup>这一年,从福州输出1573万余磅茶叶。次年,上升到3500万余磅。逮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突破了6000万磅大关。此时,“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光(光)咸丰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方。”<sup>[21]</sup>他们每年“首春,由福州结伴溯江而上,所带资本,辄百数十万。”<sup>[22]</sup>往返于闽江沿线。闽东北茶区是重要的货源供应地。由于宁德县为闽东北门户,得交通之便利,为宁德所辖又地处宁德、福安交界的猴墩畲族村遂成了闽东北茶叶的重要集散地。该村民国《雷氏宗谱》云:“清咸丰、同治时,闽省大开茶局,猴墩遂为商旅辐辏之场,而五都之市集焉。”这是福建省惟一的畲族茶叶市场,同时,也诞生了福建第一代的畲族茶叶商人。该村雷志波是茶市首倡者,《雷氏宗谱》称他“天资高迈,器宇超凡,海涵地负之襟怀,有非浅局可规也。我兄指志波,能人所能,人不能能我兄之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创办“雷震昌号”茶庄,在他的带动下,同村族亲雷志满、雷成学分别办起了“雷泰盛号”、“雷成学号”茶庄。其他畲村受其影响,也办起茶庄。如际头畲村办起了“雷伏保”茶庄、中前畲村办起了“雷德庚”茶庄。随后,“雷震昌号”茶庄扩展为“灿记”、“庆记”茶庄;“雷泰盛号”茶庄扩展为“满记”、“祥记”茶。茶市鼎盛时期,猴墩村每年输出四千余担茶叶。<sup>[23]</sup>商品经济的介入,突破了畲族乡村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茶叶带给畲族乡村的经济繁荣也促成了畲族乡村文化的变迁,最为明显的是畲族乡村家族记忆的进一步物化和家族文化的再一次勃兴,即族谱的定期而大规模编修和祠堂的鼎建。同时,畲族乡村第一代商人开始具备了市场经济的眼光,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维护商业利益的法律的庇护下走进市场,惟一的商场游戏准则是建立在互相诚信的链条上。

文化地理坐标7 光绪二十四年·钟大焜途经闽东

钟大焜,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原籍江西萍乡县,其祖父钟炳泰因皇封中宪大夫,由江西迁入福建省城三牧坊。其父钟肇英曾游宦于建安、同安、诏安、延平等地,其兄弟四人大钧、大荣、大焜、大椿均获功名,其中三人中进士。大焜为同治庚午科(1870年)进士,官

至四品銜刑部直隶司主事 邵选知县。<sup>[24]</sup>清光绪年间,他萌发编修钟氏连环谱的念想,他认为“惟远省聚难传抄,兹先以闽省为始,聘请同宗某某负笈遍历钞录,再加编辑,期以二岁蒞事,再以余力兼及他省。酌拟章程,有未臻明密,伯叔兄弟损益而进教之则。”<sup>[25]</sup>并于农历十二月,在闽福清棋山族人处议,延请族人遍历近省鈔辑谱帙,冀得善本,校合同异”。<sup>[26]</sup>钟大焜棋山修谱遂为钟氏家族的百年佳话。光绪二十四年钟大焜“以事远行,途经福州之罗源、宁德,因延族人某某沿途修辑”。福州及福宁府编修连环谱,是钟大焜的第二步行动。数年之功,共汇集了福州省城、江西萍乡、侯官、闽县、福清、罗源、永福、霞浦、福安、宁德等地177处钟氏家族谱系,编成五卷本《颍川钟氏族谱》。这部族谱随着有关钟大焜的传说,广泛流传于闽东畲族乡村。在这部族谱中,刊载了一份及其重要的文告,这份文告以“闽县正堂抄奉”形式刊载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的福州《华美报》<sup>[27]</sup>内,告示云:

“署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使司兼管驿传盐法道余为示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据家丁林添稟称,家主刑部主事钟大焜因修谱到福宁所属各县,见有一种山民,纳粮考试,与百姓无异,惟装束不同,群呼为‘畬’。山民不服,时起争端。家主向山民劝改装束与众一律,便可免此称谓,无不踊跃乐从。惟山民散处甚多,稟请出示,晓谕等情,到司据此本署司查,薄海苍生莫非天朝赤子,即闽粤之蛋户,江浙之情民,雍正年间,曾奉谕旨,准其一体编入民籍,况此种山民完粮纳赋、与考服官,一切与齐民相同,并非身操贱业者比。在国家有包含编覆之仁,在百姓岂可存尔诈我虞之见,但其装束诡异,未免动人惊疑。且因僻处山陬,罔知体制,于仪节亦多僭越。自非剴切晓谕,则陋俗相沿不革,即群疑亦解释无由。除稟批示并通飭外,合亟示谕为此示,仰合省军民、诸色人等知悉,古来槃瓠之说,本属不经,当今中外一家,何可于同乡共井之人,而故别其族类。自示之后,该山民男妇人等,务将服式改从民俗,不得稍涉奇装,所有冠丧婚嫁应遵通礼,及未子家礼为法,均勿稍有僭逾,授人口实。百姓亦屏除殄域,等类齐观,勿仍以畬民相诟病。喁喁向化,耦俱无猜,以成大同之治。本署司有厚望焉,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上述文告可知,钟大焜为了避免闽东一带的畬民因服饰之异而被目为异类,而规劝他们改装,并以文告广布于天下,为闽东畬民正名。清朝末年在福建城镇的服饰革命中,既推行了现代便捷的汉装,又将包括畬族妇女服饰在内的民族装束污为“奇装异服”而加以革除。钟

大焜之举可谓煞费苦心,他不知道,机械同化并不能根本改变畬民的命运,也根本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但在封建时代,钟大焜作为钟氏畬民的代言人,毕竟从家族的角度,表明了固有的权利和自尊。为家族修纂连环谱,而引发成一种民族的团结和呐喊,以积极的家族文化活动来修复畬族传统文化被现代文明撕裂的心灵伤口,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的价值,远不在于族谱本身。

文化地理坐标8:光绪二十五年·霞浦县福宁三明会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闽省畬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福宁府驻地霞浦县西门外教场头,由畬民自发集资建成了福宁三明会馆。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三明会馆。民国《霞浦县志·实业志》的附表载:“西附城区乡农会,在城三明会馆(即山民会馆)内”,三明会馆,又称山民会馆。民国八年会馆迁往北街乘后境(今霞浦县松城镇旗下街3号)。该会馆是一座砖木结构的“火墙包栋”歇山顶六扇大瓦房,分前后二进,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前厅顶棚为八角藻井,中庭设大型神龛,安置高约2米、宽近1米木雕金祖牌,祖牌正中阴刻“敕封 盘护忠勇王 神位”。神龛前置案桌,备有大香炉、烛台等。大厅有金漆楹联,其中之一为“功建前朝帝誉高辛亲勅赐,名垂后裔皇孙王子免差徭”。大厅两侧壁上有墨书楷书6字,曰:“盘、蓝、雷、钟、李、吴”,每字均有1米见方。前后座及廊庑的其他房间多为客房。大门横匾,上书“福宁三明会馆”,系浙江云和畬民蓝文蔚题写。会馆功用包括联谊、接待、集会、祭祀、议事、咨询、救济、代为诉讼等,其主要效用仍为接待往来的畬族宗人。客人以来福宁府做生意者为多,长住客不多,仅几位在福宁府读书的畬族学生。会馆的祭祖活动最隆重的是民国九年(1920年),即会馆迁入城内的第一年。是年春节,霞浦西乡、南乡、东乡、附城区,以及福建省的福安、宁德、福鼎、寿宁、罗源、连江、闽侯、浙江省的泰顺、平阳、云和、景宁等县的畬民均来参祭,祭祖活动连日分批举行,由各董事和各地畬民诸姓族长轮流主持。会馆经所在地霞浦县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官方注册法定的“苗夷民族”的“公益团体组织”,而载入《福建年鉴》。会馆衰败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霞浦兵乱。福宁三明会馆是闽东畬族标志性的地标,显示了闽浙两省畬民力量自发、主动的聚合,这里汇聚了畬族文化、经济精英,这里扩大与突破了家族单姓祠堂的原有功能,更是以族内联谊、城市商会的形式拓展了畬族的社交活动。



文化地理坐标9: 民国13年·霞浦县白露坑“歌先生”钟学吉逝世

霞浦县东南部白露坑畲族村,是畲族小说歌的发源地。畲族谚语云:“要问歌先生,就去白露坑。”求教歌秀才,白露坑峒来。“白露坑人最早最擅长将汉族章回小说、评话唱本改编为畲族长连正歌,此歌又称“小说歌”。创作小说歌的代表人物便是钟学吉。钟学吉,谱名国吉,奏名法宁,学名黄春,因寄名于当地土主陈师公,又名陈吉。他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7岁入私塾,师从堂伯父钟廷吉,从小接受畲族歌教。光绪元年(1875年)年方二十钟学吉当私塾先生兼巫师。其时他开始创作歌谣,如《花名歌》、《鸟名歌》、《十贤歌》、《十女歌》、《十字歌》、《起书堂》、《大读书》等。他根据祭祀仪式上的本族史诗《高皇歌》改编为通俗易懂的《高辛氏》。又改编小说歌《诸葛亮》、《孟姜女》、《唐伯虎》等。他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了小说歌《钟良弼》,流传于闽浙畲族乡村。始作于民国8年,修定于民国10年的《末朝歌》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钟学吉在歌尾的落款,按歌先生传统,采用“拆字歌探”法,即以字谜的形式,将创作者的名字隐于歌中。如《末朝歌》结尾“做歌人在白露坑,谱分陈家讨有名,上字分做二十讲,土字加口是郎名”,此中隐约透露他的别名“陈吉”,有的歌谣落款“三人同日去看花,廿一由八回家来(学名“黄春”)文字加上十一口(俗名“学吉”)”,当时名声仅次于钟学吉的歌先生钟学算、雷韶春、雷德荣等。清末民初是白露坑畲族歌谣创作的鼎盛时期,那时诞生了众多的畲歌唱本,也诞生了一批畲族歌先生。钟学吉的逝世,不仅是一代歌王的消逝,更是闽东畲族歌谣文化史中白露坑时代的终结。白露坑时代留给世人的精神文化遗产是畲族歌谣的形式上创新、内容上丰富和题材上拓展,从此,畲族歌谣的触角进一步伸进了汉族民间文学领地,也触摸到了现实与时代的脉搏。

文化地理坐标10 民国18年·古田县毓青小学聋哑班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们进入中国,闽东是他们最早涉足地区之一,他们的足迹也留在了畲族乡村。民国17年,古田县畲族女青年雷静贞受美国教会委派前往山东省烟台启暗学校培训。民国18年8月,她回原籍古田县,在毓青小学附设聋哑班,担任负责人,收盲聋儿童25人,培养聋哑儿童教师2人,该校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7所聋哑学校之一。雷静贞是闽东较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畲族青年,她治学严谨,教学有方,为聋哑教育事业艰难跋涉,是中国聋哑教育的创始人之一。雷静贞是闽东畲族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代表人物。

文化地理坐标11: 民国19年·霞浦县草岗畲族村圣义小学

民国19年(1930),英国3名基督教传教士在霞浦县草岗(现名茶岗)畲族村创办圣义小学。聘请教师1名,免费招收学生30人,4年后,教堂烧毁,学校告停,畲族村带有宗教色彩的现代文明便匆匆止步。这年,古田县人文荟萃的富达畲族村创办了国民学校——富达小学。这是闽东畲族村的首批以现代教育理念指导的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民国23年,霞浦县畲族聚居地盐田乡南塘保和松南乡步头保分别创办国民学校,两校教师4人,畲族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3左右。民国27年,福安县长潭、金斗洋创办简易小学。民国28年,富达小学改名为富端中心小学。民国时期,畲族乡村为数不多的国民学校一改私塾教学的形式和内容,为畲族乡村融进了全新的现代教学理念和现代文明气息。

文化地理坐标12: 民国19年·马立峰在福安县凤洋畲族村

民国19年(1930),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马立峰到凤洋畲族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畲族党员,并建立了闽东第一个畲族村党支部。钟阿尔是闽东最早的畲族党员之一。民国21年9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福安县溪北洋上马山畲族村成立。民国22年3月,马立峰、施霖等人在霞浦县杯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在畲族村建立了中共里马支部,3月又建立了中共霞浦县青蛟畲族村支部。民国23年2月,建立了福鼎县双华畲族支部。民国22年11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在霞浦县西胜畲族村整编为闽东游击支队,次年1月,在西胜畲族村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9月,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成立时,福安、霞浦、柘荣、寿宁、罗源、连江等县有300多名畲族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参加。从民国19年至民国26年,闽东地区的福安、福鼎、霞浦、柘荣、寿宁、周墩、古田、罗源、连江等县(特种区)畲族聚居地先后建立了135个党支部活直属党小组,共有畲族党员490多人。自民国22年至民国25年,闽东许多边区县委先后在畲族聚居地成立:10月,中共霞浦县委在柘荣县草籽坪畲族村成立;民国25年6月,中共桐霞县委在福鼎县白石畲族村成立。民国35年12月闽浙赣区党委在古田县石桥头畲族村建立党小组和畲族武工队,次年4月,这支武工队编入闽浙赣游击纵队。民国36年6月至民国38年8月,中共罗源工委、连罗宁边区工委、连罗林边区工委、连罗边区工委等地方党组织先后在畲族村建立了数十个党支部或党小组。福安县畲民雷美孚于民国36年9月,任中共福安县委委员,宁德县畲民蓝成友于民国36

年11月,任中共闽清中心县委副书记。闽东畲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了闽东地方党组织和红军闽东独立师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在闽东畲族乡村的传播,给畲族村民的文化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畲族乡村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注入了进步思想。

文化地理坐标13:民国23年·福安县柏柱洋东山畲族村

民国23年3月,闽东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维埃政府委托中共闽东特委委员曾志参照中央苏区分田的方法、经验,主持制定分田政策,颁布分田大纲。并在福安县柏柱洋东山畲族村进行分田试点工作。东山畲族村是闽东最早的土地改革试点村之一。闽东苏区分田大纲中关于畲族村分田的具体规定:“畲族妇女则与男劳力同等看待——每一个劳动力产量400斤的水田。”全苏区37%以上的畲族农民都分到土地。同年春,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9个县级苏维埃政府,42个区级苏维埃政府,其中有3个区级苏维埃政府设在畲族聚居地:(1)下西区苏维埃政府,下西区又称溪北区、外西区、梧桐区、礐溪区,成立于民国23年2月5日,隶属于(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驻福安康厝凤洋畲族村。(2)下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民国23年12月,隶属于(福)安(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区苏机关驻福安甘棠过洋畲族村。(3)桐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民国35年6月,隶属于桐霞县革命委员会,区苏机关驻福鼎浮柳白石畲族村。闽东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畲族聚居地先后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21个,90%的畲族村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畲民担任村苏维埃主要干部的有500余人。同年冬,国民党军队围攻苏区后,畲民又丧失了土地。一个短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剧场效应深烙在闽东畲族乡村记忆之中,这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实践都驱使了畲族乡村“权力”、“法律”、“组织”、“控制”等一系列政治人类学的关键词都赋予了全新的文化内涵。现代意义的政治管理与经济实践给畲族乡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阅读闽东畲族文化地图,选取了13个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坐标,其中之一不在闽东,却与闽东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制度文化等息息相关外,其余的坐标均确定在闽东区域内。从事现代化研究的西方学者认为:“既定的制度或文化包含着许多方面或维度,每一方面对施加于社会的各种新的影响力反应都会不同。传统与现代性经常互相加强,而不是对立冲突。”<sup>[29]</sup>畲族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在悄悄地进行着,对接的过程就畲族乡村本身而言是自然而然的渐变,不管是主动还是被

动,均没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过程。在这些地理坐标上我们发现畲族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三个端口,即“畲族乡村政治文化的二次转型”、“畲族乡村经济文化的二次转型”以及“畲族乡村的文化接受、传承与发展”。

1. 畲族乡村政治文化的二次转型:人类学家将政治作为人类创造的一个社会文化来考虑时,他们强调了“组织”与“控制”两个关键词。“组织”是人们共同体的构成;“控制”是对人们共同体的管理。起码在清康熙年间,包括闽中、闽北、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的畲族乡村还是沿袭着游耕时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即自身生产行为的松散与政府对其控制的松弛,总而言之,他们仍然是在一个极其宽松的官方社会管理系统和行政事务下的极度自由的流烟人群。(见“文化地理坐标1”)到了乾隆年间,他们才逐步改变了这种千百年来的生存状态。“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等一整套封建社会的乡村管理措施渐次网罗到了畲族乡村。乾隆朝对于福建民族散居地区的苗夷的关注,对畲族乡村的内务管理和控制,虽然不必采取“土司制”、“盟旗制”、“伯克制”等“羁縻之术”,但是毕竟不能与一般的编户齐民等量齐观,从感性认知开始,将绘制男女畲民的图像列进了供皇帝御览的包括外国使节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各色人等的纪实图像“职贡图”中。(见“文化地理坐标2”)接着便是一系列的保甲、赋税、徭役制度,递加在了畲民身上,使畲民融进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系统。乾隆朝在畲族乡村施加了封建政治文化传统中习见的乡村控制力,自此,畲族村落组织更加符合封建王朝乡村管理的规范,畲民也相应获取了臣民的赋税、徭役等义务,同时也有了得到了天子有限的护佑。今天尚存的立于闽东数个村落“禁骚扰”的石碑(见“文化地理坐标4”)表明清代地方政府对畲民有关权益的保障。而咸丰七年“德政碑”的设立(见文化地理坐标5)就表明了清政府对畲族乡村的军事“驯化”。既抚平受惊扰之心,又扼杀不屈之志,这是封建王朝惯用的两手。就实际而言,畲族乡村的管理与中国传统的乡村一样,即地方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力仍是极其有限的,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是“有限官僚制”,<sup>[30]</sup>在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组织秩序和控制力量:一种“官制”秩序和朝廷力量;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后者以家族(宗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自发组织。每一个家族(宗族)和村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这个“自治体”结成为“蜂窝状结构”。<sup>[30]</sup>有时后者往往具有支配的力量。畲族乡村实现社会模式转型,落实了“皇权——族(家族)权”的二元模式。但



是,畬族乡村不同于一般中国乡村的是,主要不是靠乡土政治精英——乡绅阶层来连结“皇权——族(家族)权”的两股力量,而主要是靠族内耆老,即族长、房长以及族内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些草根精英力量来协调乡村内部的关系。到了光绪二十五年霞浦县福宁三明会馆建立(文化地理坐标8),畬族乡村的民间组织力量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会馆是明清异籍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同乡性社会组织。<sup>[31]</sup>包括士绅会馆、试子会馆、工商会馆,以及海外移民的地域性会馆等,而福宁三明会馆均不同于上述的任何一种会馆,却是一种别具特色的,以乡村畬民为主的“盘、蓝、雷、钟”等畬族姓氏组成的族群性会馆,这种会馆在我国是鲜见的。在闽东、闽中、浙南、浙西南等地畬民心目中本来有一个幻想中的畬族祖祠,在潮州凤凰山。而在清末民初三明会馆的建立将心灵中祖祠的现实化,固定成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扩大了一般性的畬民祠堂的内涵,发挥了超地域性、超姓氏的畬族祖祠的功能,由此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以民族的旗帜整合了闽东、闽中、浙南、浙西南这些地方乡村畬民的宗族力量。民国时期,畬族乡村又实践了社会模式的第二次转型,虽然这个转型是短暂和局部的。这种转型的实践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农村农民政策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把包括乡村畬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对象,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闽东农村建立起了秘密的党支部等农民革命组织,成立了县、乡、村各级的苏维埃政府,闽东畬族乡村革命组织也在这场红色风暴中崛起(见文化地理坐标12)在新兴的组织模式中畬民的被动融入变成了主动参与,更体现了一种现代政治文化的自由精神,而畬民族传统中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团结精神使得畬族社会组织具有更加顽强和彻底的现代色彩和革命性,在最艰苦的闽东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畬族老区和游击区成了闽东地方党组织和地方红军游击队最为可靠的后方。这个时期的畬族乡村社会模式的第二次转型,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闽东畬族乡村社会变革的预演,也形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雏形。

2. 畬族乡村经济文化的二次转型:人类学家将经济作为人类创造的另一种社会文化来考虑时,他们强调了“交换”与“市场”两个关键词。“交换”是人们的生产品(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种形态)在社会的转移和流动;“市场”是人们转移与流动产品的场所(包括实在与虚拟两个系统),决定着生产品流动的范围与程度。封建时代,我国乡村经济表现为“人-地”关系的互动,这种关系的互动决定了“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和特点。而封建时期的农村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又是相辅相成的,政治

文化又决定了经济文化中“人-地”互动关系的直接后果。早年作为列入流烟民册的山地“盲流”畬族,其聚落的生产方式是游耕(见文化地理坐标1)深居幽谷,其素艺则开垦荒山,自耕自食,并有栽靛者。其田弃瘠就腴,每耕三年后,则又徙而之他处耕种,又三年亦如之。<sup>[32]</sup>“人-地”关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经济运行仅限于内部家族的近距离交换,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几近绝缘。其经济之俗大抵如古田县畬民“近则附近民居各村与民往来交易,亦有承耕民田,能自变其俗。惟疏远者则相沿旧习如故。”<sup>[33]</sup>清乾隆年间畬族乡村因“编图隶籍”而伴随的“编甲完粮”;“兹以其俗顿异”,<sup>[34]</sup>即一改“人-地”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代之以“人-地”关系的相对稳定,这时,畬族乡村经济被动地纳入了封建王朝经济常规的运行轨道。闽东畬族乡村经济与当地市场的关系不密切,不能像开发较早的闽南、闽西畬族乡村那样,能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他们除了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取“天子子民”的正统名分外,自身还没有自发形成的墟市贸易,他们只能依靠在附近汉人聚居的乡镇中通过有限的交易活动获益。清咸同年间,闽东茶叶贸易的兴起给畬族乡村带来了契机,他们突破了固有的“人-地”互动的原有模式,以宁德猴墩畬族乡村茶叶商人为代表(见文化地理坐标6)在商品经济的交易中尝到了商品附加值的甜头,他们假道于水陆两条茶叶之路,拓展了商品交易的市场,此时,有的畬族乡村出现了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端倪,因为这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封建道德诚信体系之中,缺乏铁的市场游戏法则又潜在着巨大的风险,也没有得到封建当局有效的保护。但是不管如何,咸同茶事对畬族乡村而言,那行走在福宁官道上的畬民茶叶商队,那每年从福州茶行领回来的一桶桶白花花银圆,——畬族乡村毕竟或多或少领略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无限风光和灿烂图景。20世纪30年代末,闽东苏维埃运动颠覆了千百年来的封建时代“人-地”关系的基本格局,闽东畬民开天辟地地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见文化地理坐标13)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意义深远。因为,随之而来的苏维埃政府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直接改变了乡村畬民的行为方式,更直接激发了畬民的自信心和创造力,那时流传于畬族山乡的歌言《十送红军》、《杀头也要干革命》等便真实地表达了畬民的情感和意志。

3. 畬族乡村文化接受、传承与发展:清代和民国时期是闽东畬族乡村文化碰撞、交融的时期,作为畬族传统文化基本构建的畬族歌谣文化在畬族乡土文化精英的倡导、创造和推广下,从内容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这

是畬族文化的内在力量。(见文化地理坐标9)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剧烈动荡;日益增长的运输、通讯、识字率和水平流动率,在促进思想传播时,也强化了“大传统”的范围和影响,使之渗透到越来越多的社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去。”<sup>[8]</sup>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被畬族乡村接受,畬族乡村不再仅仅借助口耳相传的“歌教”的家庭教育来传承文化,而更注重设立私学专馆、延请私塾先生,传授四书五经,通过家族私学教育,畬族传统文化融入了中华大传统文化之中。畬族乡村第一次进行了社会分工,诞生了第一代的封建时代读书人,他们专心尝试着科场竞争,历尽艰辛,并赢得功名,还有极少数人入仕为官,进入了上流社会。(见文化地理坐标3)畬族乡村的文化嬗变来自于五股外力,其中最大的力量便是以上所说的中华大传统文化的冲击,畬族乡村固有的乡土传统文化被解构、被覆盖、被取代、被同化,从物质文化(服饰文化等)到精神文化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见文化地理坐标7)还有三股力量是在畬族乡村的局部显示,并发挥有限的作用。包括(1)民国时期乡村现代教育的启蒙作用。即局部畬族乡村建立了国民学校,畬家子弟接受

了现代教育的熏陶;(2)城市市场经济的影响。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发展鼎盛的福建华茶贸易,使得部分畬族乡村村民嗅到了经济发展的契机,畬族乡村建立起了茶叶贸易的初级市场和第一代畬族茶商足迹从闽东延伸到了福州等地;(3)基督福音的传布。闽东是我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了包括畬族乡村在内的闽东偏远山村,此时,畬族乡村也随之出现了教会创立的现代学校。(见文化地理坐标11、6、10)以上三个方面的力量,虽然不能全面推进畬族乡村的文化变迁,但是,毕竟给予畬族乡村注入了异质文化的内容,对畬族乡村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一股力量是排山倒海、异常迅猛的,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红色幽灵”在闽东畬族乡村的徘徊,随着畬族乡村出现中共党支部、苏维埃政权、红军游击队组织,以及分田分地活动的展开(见文化地理坐标12、13)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在畬族乡村的剧烈碰撞,给畬族乡村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根本性的震撼,动摇了传统文化之中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对于过去传统的质疑、否定和决裂,以无比冲动的激情迎接未来。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畬族乡村社会主义文化崛起的前奏曲。

## 参考文献：

- [1]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95-196.
- [2]房龙.房龙地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阅读参照系”.
- [3]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月,第18页.
- [4]长汀县志.卷35,杂录畬客[M].清光绪五年(1879年).
- [5]龙岩州志.卷12《杂记志·畬客》。《龙岩县志》,卷29《杂录》,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刊本.
- [6]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末之八《杂录》,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种玉堂镌.
- [7]平和县志.卷12,杂览志[M].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 [8]永春县志.卷7,风土志[M].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 [9]德化县志.卷3,疆域志·附风俗[M].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 [10]龙溪县志.卷10[M].风俗·杂志.
- [11]南平县志.卷11,礼俗志·杂俗[M].民国八年.
- [12]转引自李泽春、刘如仲编著.清代民族图志[M].“前言”,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13]辛竟可.古田县志.卷之二,风俗·畬民附[M].乾隆十六年.
- [14]重纂福建通志.卷140[M].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 [15]闽东畬族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富达畬村志[M].2003年铅印本,第57页.
- [16]福安县志.卷16[M].职官.
- [17]黄裳.演山集[M].卷46.茶法.
- [18]乾隆.宁德县志.卷一[M].舆地志·物产.
- [19]乾隆.福宁府志.卷12[M].食货志·物产.
- [20]班思德.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M](最近十年各埠海关报告)
- [21]申报.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十一日.

- [22]袁干.茶市杂咏.
- [23]蓝炯熹.猴墩茶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第11-13页.
- [24]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M].光绪二十年(1894年)
- [25]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颍川钟氏修辑总谱序[M].光绪二十年(1894年)
- [26]钟大焜.颍川钟氏族谱·颍川钟氏修辑总谱后序[M].光绪二十七年.
- [27]参见.华美报.第一七号,第一五页.
- [28]古斯费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A].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2月版,第322页-323页.
- [29]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 [30]微微安尼·苏.国家的成就:中国政治团体的架构[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
- [31]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M].岳麓书社,2003年,第218页.
- [32]乾隆.古田县志[M].卷二一.
- [33]乾隆.古田县志[M].卷二一.
- [34]乾隆.古田县志[M].卷二一.
- [35]古斯费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A].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2月版,第324页.

## Map of the Shes ' culture in Eastern Fujian: process of connec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LAN Jiong-xi

(The Nationality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Provincial & Religious  
Affairs Department, Fuzhou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chooses som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that have happened in some Shes ' villages to form a map of the Shes ' culture, and it, mainly from perspectives of political culture, economic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systematic culture, and so on, displays the process of connecting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Sh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赖艳华]